

北京专史集成

主编 王岗

北京政治史

本书主编 王岗

 人民出版社

北 京 专 史 集 成

主 编 王 岗

北京政治史

本书主编 王 岗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政治史 / 王岗 主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

(《北京专史集成》/ 王岗 主编)

ISBN 978-7-01-007397-2

I. 北… II. 王… III. 政治制度—历史—北京市

IV.D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9177 号

北京政治史

BEIJING ZHENGZHISHI

主 编: 王 岗

出版策划: 张秀平

责任编辑: 关 宏

封面设计: 曹 春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3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 张: 35.25

字 数: 5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07397-2

定 价: 8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序

北京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就一直从事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30年来，在全所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了一些北京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其中，又以曹子西先生主编的《北京通史》为代表，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而《北京通史》的问世，又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北京历史文化奠定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

2006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加大扶持力度，提出把《北京专史集成》列入院科研重大课题，使得我院的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从整体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历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已经开始对北京专史进行研究，如王玲女士撰写有《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尹钧科先生撰写有《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于德源先生撰写有《北京农业经济史》，吴建雍等人合写有《北京城市生活史》、《北京城市发展史》，等等，这些专史的问世把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逐步引向深入。但是，要想形成一套体系完备的专史研究系列，显然仅仅依靠个人的研究力量是不够的，必须组成一支力量相对强大的科研队伍，才能够完成系列专史研究的繁重工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领导组织历史研究所的全体科研人员对《北京专史集成》课题进行了认真的论证。特别是课题总顾问刘牧雨院长和课题总策划戚本超副院长对课题中研究项目的编写原则和立项次序都给予了精心指导。经过论证，初步确定了《北京专史集成》课题的第一批研究项目，即：

1. 北京政治史；
2. 北京经济史；
3. 北京农业史；
4. 北京手工业史；
5. 北京商业史；
6. 北京军事史；
7. 北京文化史；
8. 北京文学史；
9. 北京美术史；
10. 北京学术史；
11. 北京著述史；
12. 北京戏剧史；
13. 北京风俗史；
14. 北京考古史；
15. 北京民族史；
16. 北京宗教史；
17. 北京佛教史；
18. 北京道教史；
19. 北京伊斯兰教史；
20. 北京基督教史；
21. 北京教育史；
22. 北京城市发展史；
23. 北京建筑史
24. 北京园林史；
25. 北京陵寝史；
26. 北京地理学史；
27. 北京交通史；
28. 北京城市生活史；
29. 北京建置沿革史；
30. 北京对外交流史；
31. 北京水利史；
32. 北京饮食史；
33. 北京服饰史；
34. 北京环境变迁史；
35. 北京音乐史；
36. 北京名胜史。

这些研究项目，只是北京专史庞大体系中的一小部分，今后随着科研工作的不断深入，专史的项目也会不断增加。《北京专史集成》经过历史研究所论证之后，院领导又组织全院的专家学者对这个重大课题进一步加以论证，并且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对专史的撰写工作有很大帮助。

《北京专史集成》中的每部专史的容量，视其内容的多少，大致在30万字左右，有些内容较多的，字数可以多一些，反之，则会少一些。各部专史的时间跨度，一般始于远古，迄于新中国建立。有些部专史在撰写过程中，时间会有所下延。如《北京建置沿革史》，必须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才能够对今天北京政区的沿革状况有全面的叙述。各部专史的地域范围，也不是严格局限在今天的北京政区，而是根据不同朝代政区划分的变化而随之变化，如汉唐时期的幽州，辽代的南京析津府，金代的中都大兴府，元代的大都路，明清时期的北京顺天府，等等。政区范围的大小虽然会不断变化，但是其核心地区仍然是今天的北京。

《北京专史集成》的撰写，有很多难以处理的地方。例如，“专”和“史”的关系。“专”是指专门、专业，如在《北京宗教

史》中，“专”是指宗教或是宗教学，而“史”则是指在北京历史上曾经发生或是出现过的、与宗教有关系的事件或人物，当然也包括相关的典制。如在《北京宗教史》中，我们所研究的佛教史，主要的着眼点不仅仅是在北京地区的禅宗、律宗、净土宗等佛教流派的发展、变化，更重要的，是着眼于这些佛教流派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其代表人物的社会活动、历代统治者和社会各界对这些宗教派别的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重要宗教事件，等等。我们认为，要想处理好“专”与“史”的关系，一方面，要掌握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又要对当时的历史状况有准确的认识，掌握宗教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正确认识不同历史时期宗教产生、发展和兴衰的变化历程。其他专史的撰写工作也是如此。

再如，“全国”和“地方”的关系，换言之，即“全局”和“区域”的关系。在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之前，所有的北京史都是“地方史”，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也有着明显的“区域”性质。但是，当北京成为全国首都之后，在北京发生的许多史事除了具有“地方”和“区域”的性质之外，又具有了“全国”或是“全局”影响的特质。如“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其影响范围之广，影响力之持久，显然不是局限在北京地区的。此外，由于北京的统治中心地位，有些发生在其他区域（甚至国外）的重大历史事件，也会对北京产生巨大的影响。如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这些重大事件的始发地虽都不在北京，但其对北京的巨大影响甚至超过了在北京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因此，如何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在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中确实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

《北京专史集成》课题立项后，得到了学术界和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首先，是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著名史学前辈在年事很高、工作繁忙的情况下，热情支持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慨然担任特聘学术顾问，并且对北京专史的撰写工作提出了珍贵的指导意见；有些史学前辈还在百忙之中审阅了部分书稿的内容。其次，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陈之昌主任和李建平副主任对本课题的重视，使《北京专史集成》得以被列为市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再次，本课题的出版工作得到了人民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在出版经费较少的情况下，得以立项出版。特别是资深历史学编审张秀平女士和诸多编辑人员，认真审阅全部书稿，并且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

意见，为各部专史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批批老专家学者们为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他们的退休对北京文史研究带来了一些影响。但是，许多已经退休的老专家仍然坚持工作在科研第一线，笔耕不辍。《北京专史集成》中的一些项目就是以他们作为骨干带领年轻同志完成的。一批批青年学子陆续来到所里，他们在科研能力上尚需锻炼，在学术见识上亟待积累，但是，他们有朝气，有吃苦耐劳的干劲，有新的更加开阔的视野，假以时日，他们在《北京专史集成》研究中的成果将会越来越多。我相信，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热心帮助下，在历史研究所全体新、老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持之以恒，《北京专史集成》将会为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不断增添新的科研成果，为首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不断做出新贡献。

值此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建院 30 周年、《北京专史集成》开始出版之际，是为之序。

王岗

2008 年 10 月

前 言

什么是政治，中国著名政治家和革命领袖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论持久战》）曾经做过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对于他所推崇的西方民主政治则形容为：“民主政治是各种集团、各种力量以及各种利益之间的极其复杂的妥协过程。”（见其所著《领袖们》第九章）两位领袖和政治家的见解是十分精辟的，战争和妥协都是政治活动的常用手段，前者是在战争时期对政治的评价，而后者则是在和平时对政治的评价。中国古话“道洽政治，泽润生民”（见《尚书》中《周书·毕命第二十六》），则更加言简意赅，更加全面。也就是说，统治者要用大家都公认的道理来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说得很到位，真正做到却不容易。

什么是政治史，政治史就是对以往人们政治活动的记录。而这种记录，是人们从古到今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古代，从孔夫子作《春秋》到司马迁写《史记》，从无名氏的《竹书纪年》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些历史名著为我们提供了撰写政治史的典范。国外史学家关于政治史的著述也是汗牛充栋，如古希腊的著名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罗马的塔西佗所撰写的《历史》和《编年史》等，皆是脍炙人口的政治史名篇。换言之，在古代中外历史学家的撰述中，泰半为政治史著作。古人为什么要写这些政治史著作？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指导当前的政治实践。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君臣关系，在以往古代政治史中是占有较大比重的议题，民主

与专制，则是当代政治史中不可缺少的议题。从人类政治史的总体发展历程来看，先是经历了原始民主政治的发展阶段，然后进入奴隶主专制和封建专制的发展阶段，最后进入当代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阶段。在当代人们的普遍观念中，民主是必须发扬的，应该肯定的；而专制是必须废弃的，应该否定的。但是，民主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发挥最佳政治效用的，在中国古代，民主是百姓的权力，而专制则是政治家（包括帝王和政府官员）的权力，二者是处在一个矛盾统一体中的两个侧面，既是对立的，又是你中有我的融合体。政治的最终目的就是保持社会整体秩序的稳定，而在许多历史发展时期，例如中国古代，对于巩固社会秩序而言，专制所能够起到的作用，要远远超过民主。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可以实行民主，而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统一王朝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却不得不实行专制，以保证行政效率的最优化状态。

在中国古代，凡是明君或者暴君在位的时期，皆是专制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不仅百姓，就连众臣也没有发表政治见解的地方。而当昏君或者庸君在位的时期，就会出现大臣秉政的情况。明君的专制，带来国家发展的强盛，而暴君的专制，却会导致国家的灭亡。以三国时期的曹、刘为例，曹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明君（死后被尊为魏武帝），独断专行，虽未在君王之位，“挟天子以令诸侯”却已经行使帝王的权力，是君王驾驭臣下的政治格局。而刘备是一位徒具虚名的庸君，必须靠诸葛亮和关羽、张飞兄弟的支撑才得以维持割据的局面，是君王依赖臣下的政治格局。换言之，昏君或是庸君在位，是政治上相对“民主”的时期，大臣们可以发挥其政治才干。当然，明君在位时期，也会有一些“民主”（如唐太宗对魏征的纳谏），不过是在君王认同下的“民主”。大臣们行使政治权力，对君王而言是“民主”的，但是对百姓而言仍然是“专制”，君王的专制和大臣的专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有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次思想大解放的“民主”时期；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三次是“五四”运动时期。而同样也有三次文化专制时期，第一次是秦朝的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时期，大行“焚书坑儒”；第二次是西汉的汉武帝在位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三次是清朝的康雍乾时期，大行“文字狱”。但是，有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凡是在思想大解放的“民主政治”时期，却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

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各国诸侯为了争夺权势和财宝而“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的黑暗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北方少数民族大举迁入中原，百姓流离失所，中原文化“不绝如缕”的时期。而“五四”时期更是清朝政府垮台后北洋军阀连年混战的黑暗时期。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秦始皇、汉武帝和康、雍、乾等五位帝王统治的“专制”时期，正是这些朝代发展的最鼎盛时期。换言之，三次思想大解放的时期，正是中国的政治统治失控的无序时期，而秦始皇、汉武帝和清朝三帝在位的“专制”时期，又正是中国的皇权统治最强大的时期。这种历史发展进程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给人们进行政治史的评价带来了许多的困难。

《北京政治史》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其研究的时间跨度是很长的，从北京历史上有人类活动开始，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其间生活在北京地区的无数人们的政治活动，实在是太丰富了，既有数不清的重大政治事件在这里发生，也有数不清的著名政治人物在这里活动，还有数不清的政治典制在这里产生，几十万字的叙述很难涵盖如此丰富的内容。就编写体例而言，我们仍然采用了传统的以朝代更替为框架的方法。在中国，朝代的变更与政治局势的发展关系极为密切，这是其一。我们从事研究的基本史料与以往人们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主要是以朝代变更为依据的，这是其二。我们以往的史学专业划分和学术素养也主要是以不同朝代为断限的，这是其三。因此，本书的撰写共分为“先秦时期的燕蓟”、“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幽州”、“隋唐时期的幽州”、“五代及辽代的燕京”、“金代的中都”、“元代的大都”、“明代的北京”、“清前期的北京”、“清后期的北京”及“民国时期的北京（北平）”等十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其政治发展变化的特点，又相互关联，大致可以体现北京政治史发展变化的脉络。

有几点值得一提：首先，是这部书的时间跨度。《北京政治史》的断限，截止到新中国的成立，而不是到建国50周年或是60周年。因为我们在此之前编写《北京通史》时，曾经把建国40年的历史写成《通史》的第十卷。在编写过程中就感到，作为一项科研工作，特别是历史研究工作，是十分严肃认真的。而编写当代的北京历史，尤其是北京政治史，还有许多方面的条件不够成熟。一方面，是对当代史料的把握上，还有许多困难，在未能全面把握相关重要史料的情况下，很难客观叙述和评价当代北京政治史的发展历

程。另一方面，我们撰写当代北京政治史的目的，就是要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以便指导今后的政治实践。但是，当代60年的发展速度飞快，其变化之大超过了以往的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要及时总结这段时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我们目前的政治见识和学术素养而言是没有把握的。我们的原则是，做不好的事情就暂时不要做。因此，我们把当代北京政治史这一部分很有价值的内容暂时放弃了，只编写到新中国的成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得已而如此的遗憾。

其次，是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北京政治史》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纲领而贯穿全书的。我们在开始编写本书之前，曾经有过一个设想，即把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概述，第二部分是对著名历史人物的评价，第三部分是对重要政治典制的研究。经过课题组的认真研讨，最终形成了目前的框架。一方面，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和重要的典章制度都与重大历史事件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如果分成三个部分，内容中间难免有相互重复的地方。另一方面，三个部分的内容实在太多，政治事件中的朝代兴衰、都城迁移、宫廷政变、政治改革、战和关系，等等；著名人物中的明君、暴君、昏君，忠臣、奸臣、权臣、弄臣，等等；重要典制中的制度优劣、因循与变革、效绩与考评，等等，确实是几十万字的著作所无法容纳的。因此，我们把对著名人物的评价、对重要典制的研究都融入到重大历史事件之中，今后如果有机会，我们还会对北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和重要典制进行专题研究。

再次，是这部书的空间范围。《北京政治史》是以历代政区的划分范围作为研究范围的，由于历代政区的划分不断变化，因此我们的研究范围也是随时发生变化的。在中国古代，随着朝代的变更，不同朝代对政区的划分也不断发生变化，其总的发展趋势，是从粗略向精确的转变。在先秦时期，一个很小的政治单位和一个很大的政治单位都可以被称为“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兼并，政区扩大，才又有了“郡县”的划分。北京地区到了周代，据历史文献记载，有了燕、蓟两国。此后，燕国将蓟国兼并，其疆域不断扩张，远远超过了今天北京政区的范围。及秦灭六国，在燕地设置郡县，一直延续到汉唐时期。从辽代开始，北京地区成为陪都，到金代成为首都，历经元、明、清，一直都是政治和文化中心，只是政区范围在不断缩小，辽南京道比金中都路大，金中都路比元大都路大，而元大都路又比明清顺天府大。在政区范围不断缩小的情况

下，其政治影响却在不断扩大。换言之，对北京政治史的研究，越往前推，其空间范围也就越大，我们没有必要受到今天北京市政区的局限。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元代大都城变成全国的统治中心之后，许多在全国都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皆在此发生，许多顶级的政治人物都长期在此活动，因此，这个时期的政治史就不仅带有区域政治史的特点，而且带有了全国政治史的性质。换言之，自元代以来的北京政治史，在其发展进程中，既带有地方的政治特色，也带有中央的全国色彩，这一点，与其他地方的区域政治史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在政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宫廷政变，在北京没有成为都城之前是不必涉及的，而在成为都城之后，就必须加以叙述和评价。从元代到清代，宫廷政变时有发生，有些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又如，中央政府的政治体制，在北京没有成为都城之前也是不必涉及的，而在成为都城之后，就不得不加以述评。中央官制从三省变为一省，又从一省变为内阁与六部并行，也是在这个时期变化完成的。以上这些内容，为我们的研究和叙述带来了更多的亮点，同时也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北京的政治发展历程实在是太漫长了，内容也极丰富，从黄帝及其后裔们在燕蓟地区的活动，到安禄山发动叛乱震撼整个大唐王朝，直到元明清以来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更是发生了无数影响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政治事件，《北京政治史》作为一部地方政治史著作，用几十万字来加以叙述显然是不够的，难免挂一漏万。而作为一部地方政治史著作在目前的学术界还不多见，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例如，对“洋务运动”、对“戊戌变法”、对“义和团运动”等等，皆是北京政治史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术界至今仍然在争论的热点问题。人们常用“抛砖引玉”作为自谦，我们这部著作也只能称为引玉之“砖”，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研究北京政治史的著作面世，让我们共同迎来区域史研究繁荣与发展的新局面。

《北京专史集成》课题组成员

总顾问：刘牧雨

总策划：戚本超

主 编：王 岗

特聘学术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王钟翰、陈高华、
林甘泉、赵其昌、徐苹芳、曹子西、龚书铎、蔡美彪、
戴 逸

名誉顾问：陈之昌

执行策划：王 岗、李宝臣、刘仲华、章永俊

编委会主任：李宝臣

编 委：王 玲、尹钧科、阎崇年、王灿炽、吴建雍、
于德源、李宝臣、孙冬虎、袁 熹、王 岗、吴文涛、
郑永华

分卷主编：（见各卷）

课题组成员：王 岗、尹钧科、吴建雍、于德源、李宝臣、
袁 熹、邓亦兵、孙冬虎、吴文涛、何 力、郑永华、
刘仲华、张雅晶、赵雅丽、章永俊、何岩巍、许 辉、
张艳丽、董 焱、王建伟

课题组特邀成员：张 泉、齐大芝、赵志强、徐丹侗、
李建平、韩 朴、谭烈飞、马建农、姚 安、邓瑞全、
郝志群、宋卫忠等

本书主编：王 岗

**本书撰稿人员（以姓氏笔划排序）：王 岗、许 辉、
李宝臣、赵雅丽、常越男、章永俊**

目 录

序	王 岗 (1)
前 言	(1)

先秦时期

第一章 北京历史上最早的人类及其组织活动	(1)
一、旧石器时代北京的人类活动	(1)
二、新石器时代北京的人类活动	(2)
三、军事民主制时期北京的人类活动	(2)
第二章 夏商西周时期的北京政治	(4)
一、夏商时期的北京政治	(4)
二、周初分封与燕的建立	(5)
三、燕蓟分合与琉璃河遗址	(7)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燕国政治	(10)
一、春秋时期的燕国政治	(10)
二、战国时期燕国的政治	(12)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第一章 秦汉时期的幽州政治	(22)
一、秦统一中央集权下幽州政治	(22)
二、西汉大一统下幽州地区政治	(30)
三、东汉时期幽州地区的政治	(37)

第二章 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幽州	(45)
一、魏晋统治下的幽州	(45)
二、十六国时期的幽州	(48)
第三章 北朝时期的幽州	(56)
一、北魏统治下的幽州	(56)
二、东魏、北齐、北周在幽州的统治	(60)

隋唐时期

第一章 隋时期的幽州	(63)
一、隋初幽州防御突厥的战争	(63)
二、炀帝对幽州的经营	(64)
三、幽州政治势力的变化	(66)
第二章 唐前期对幽州的统治	(70)
一、幽州与唐初政局	(70)
二、武后至玄宗时期幽州势力的扩张	(73)
三、安史之乱及其影响	(78)
第三章 安史之乱后的幽州	(91)
一、幽州藩镇兵乱	(91)
二、幽州藩镇与中央的关系	(101)
三、唐末幽州藩镇的衰落	(110)

五代及辽代

第一章 五代时期的幽州	(120)
一、刘守光争霸	(120)
二、后唐与契丹对幽州的争夺	(122)
三、后周世宗收复幽州的方略	(125)
第二章 辽南京的建立	(128)
一、辽南京建立及机构设置	(128)
二、辽对南京的统治	(133)
三、辽宋争夺幽燕的和战	(137)

金 代

第一章 金中都确立之前的金代政治概况	(142)
一、金军南下与辽朝的败亡	(143)

二、北宋经营燕山府及其失败	(144)
三、辽、宋降臣的政治作用及其影响	(146)
四、燕京行台的作用及影响	(148)
第二章 金中都的确立及其影响	(151)
一、金朝政体的改革变化及其影响	(152)
二、金海陵王篡位政治评价	(154)
三、金朝统治中心的南迁与中都城的建设	(156)
四、金海陵王南伐的政治得失	(159)
第三章 金代鼎盛时期的中都	(163)
一、金朝中兴与世宗的政治举措	(164)
二、金朝统治机能的衰弱	(167)
三、金中都的吏治概况	(169)
第四章 金代衰亡时期的中都	(173)
一、蒙古军的侵袭与金朝统治中心的南迁	(174)
二、金朝的灭亡	(175)

元 代

第一章 蒙古国的崛起与燕京行省的设置	(179)
一、蒙古国的崛起及政治框架的建立	(180)
二、蒙古军攻占金都与燕京行省的设置	(182)
三、蒙古国时期的断事官们及其政迹	(184)
四、中原政治家们的社会实践及其影响	(187)
第二章 元世祖的政治举措与大都城的营建	(191)
一、元世祖忽必烈初入中原的政治实践	(193)
二、皇位的争夺与都城的南移	(195)
三、元朝统治机构的逐渐完善	(198)
四、大都城的营建与统一天下	(200)
五、民族矛盾的激化与“阿合马事件”	(202)
第三章 元代中期围绕大都城的政治斗争	(207)
一、皇位继承的关系混乱与宫廷斗争的频发	(208)
二、民族关系与宗教因素的政治影响	(211)
三、两都之战的爆发及其产生的政治影响	(213)
第四章 元代后期的大都政治概况与元朝灭亡	(218)
一、元顺帝的政治得失及其影响	(219)